

Zhong Guo She Hui

Ke Xue De San Ge Ceng Mian

Wen Hua Fang Fa Jiao Yu

中国社会科学三个层面 文化·方法·教育

■ 吴林根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三个层面

文化·方法·教育

吴林根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会的三个层面:文化·方法·教育/吴林根著. —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ISBN 7-207-06029-7

I. 中… II. 吴… III. 社会科学研究—中国 IV. G7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5611 号

责任编辑:安晓峰

封面设计:于克广 张 涛

中国社会的三个层面:文化·方法·教育

吴林根 著

出 版 者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 longpress. com E-mail hljrmchs@yeah. net
印 刷	黑龙江省教委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8
字 数	200 000
印 数	1~2 000
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7-06029-7/C·192

定价:18.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目 录

社会科学的兴国使命	(1)
一、使命:社会科学的本性	(3)
二、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	(7)
三、世界经验的升华	(12)
四、中华民族兴衰和社会主义的命运	(18)
五、落后了:必须改变的现实	(25)
社会科学的文化层面	(32)
一、社会科学的产生与发展	(35)
二、科学的特征	(52)
三、科学与人文:文化之争	(62)
四、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贡献	(77)
五、“本土化”——邓小平的社会科学思想	(96)
六、“先进文化论”与江泽民的社会科学思想	(123)
社会科学的方法层面	(153)
一、社会科学方法的要件	(154)
二、问题与方法	(164)
三、方法的局限及其互补	(170)
四、关于理论联系实际	(192)
五、科学研究与写文章	(196)
六、怎样理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202)
社会科学的教育层面	(217)

一、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科学教育	(219)
二、“三个面向”——中国教育理论的新境界	(224)
三、“从娃娃抓起”	(234)
四、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与人才培养	(239)
主要参考文献	(246)
后 记	(252)

社会科学的兴国使命

公元 19 世纪,中国历史上一个痛苦的转折时期。鸦片战争及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一步步滑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面对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强敌”,面对着西洋列强的坚船利炮与“奇技淫巧”,统治者表露的是惊恐与无奈,而中国的志士仁人则为民族的救亡图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and 追求,“科技救国”、“教育救国”就是他们开出的方略。孙中山是他们的集大成者,他主张中国应大力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实业、办学育人,并把这些措施视为“要图”、“急务”、“国脉”,力使中华民族起衰振弱。然而历史无情,治末之方终究摆脱不了“亡国灭种”厄运的到来,离开根本问题解决的理想只能无功而终,成为憾事。

公元 20 世纪 80 年代,中华民族在经受了又一次动乱的折磨后,在先进的中国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走出历史伤痛的阴影,走上振兴中华的强国之路。中国共产党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开创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这一次中华民族睁眼看世界则又是一番景象了:世界上发达国家科技发展迅猛异常、信息化时代来临之际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知识经济初见端倪、国际竞争日炽……这些给先进的中国人增强了机遇意识。党中央作出了明智的抉择:为促使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努力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即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这就对

富强之源的科学技术及其基础的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95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初次提出科教兴国战略思想，江泽民在全国科技大会上阐明：“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其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学技术和提高劳动力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1996年，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把科教兴国战略定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在排除了前进的障碍，确立了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后，这是一个识时务、抢机遇的强国之策，是中华民族崛起的号角。

科教兴国战略正在得到广泛支持和响应，转化为全民族的共识和实际行动。科教兴国之“科”毋庸置疑包括科学的两大组成部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正如邓小平曾经讲过的“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者关系而言，它们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同等重要，只有密切配合，相互结合，科学才能全面发展和进步。但是，在许多人的观念中，认为科教兴国之“科”只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不包括社会科学；或者认为社会科学在科教兴国中的作用不彰、地位不显，至多是个小角色。这种偏颇在认识上导致了窄化和歪曲科教兴国的准确含义，因而潜藏着造成实践上巨大失误之虞。当然，造成这种偏见在相当程度上要归咎于社会科学自身的原因，邓小平早就坦言我国的社会科学落后，水平低。然而社会科学的不适应或曰弊端不能构成轻视社会科学、疏远社会科学的充足理由。社会科学在科教兴国战略中的使命确实是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澄清、明确的重大问题。

一、使命:社会科学的本性

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等思想奠定了科教兴国的理论基础,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面对世界经济、科技、文化发展的新形势,创造性地提出科教兴国一系列理论,并初步形成较完整的科教兴国理论体系,且及时转化为实践。科教兴国本身就是社会科学的命题。

马克思主义把科学誉为“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这是建立于“科学是社会的人的自觉创造活动”这个基础之上的。科学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息息相关。马克思主义者有别于自然科学家,就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阐释科学的。没有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单纯自然科学技术层面的社会现代化只能是一个空想。德国科学家普朗克说过:“科学是内在的统一体,它被分解为单纯的部门不是事物的本质,而是由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科学的本质就是人类对整个未知领域的探索,包括发明创造。

人类在同自然的斗争中是“以人的方式”,即必须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是按人类的需要,以人类理性选择来进行的。自然界作用于人类社会,人类社会反作用于自然界,这种相互作用改变了自然界也改变了人类社会本身,使人类社会在与自然界的对立统一中不断得到发展,于是产生了远古时代的“哲学”,随着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斗争对立统一水平的不断提高,“哲学”分化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并且分科日细。当然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社会科学是到了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的事。人类科学事业的发展无非是为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为了获得更大的自由。毛泽东曾经说过:“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

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而“自然科学要在社会科学的指导下改造自然,”当然他的后一句话只能从根本分析意义上加以理解才是正确的,因为我们不仅需要在社会科学理论指导下改造自然,还要改造社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还有双向关系。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有失简单化了。

改造世界(自然和社会)需要社会科学作为指导也可以从现代科学事业本身的发展得到证明。软科学的出现再次证明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一致性。软科学是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多学科知识汇融而成的新的知识体系,它把客观世界当作一个整体、一个由大量变量相互作用的系统去认识和研究,在现代条件下,它的出现是人类科学由分化走向综合的标志,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门学科都在其中寻找到了用武之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汇融交叉是当代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个趋势中,社会科学思想居于指导地位。当代人们普遍关注的人口问题、环境问题、生态问题、能源问题、空间问题等等,都绝非某一个专业就可以胜任解决的,也都绝非单纯自然科学领域的事情。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可以发现,自然科学是在上与哲学思想(社会科学的最高层次),下与社会生产实践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中发展的。在社会文化的金字塔结构中自然科学处于中间层,顶部要受到哲学社会科学的浸润,底部要获得实践的支撑。与此同时,自然科学当然也反馈于上下两个层面,既作为精神力量渗透到整个社会意识形态之中,又作为一种物质力量参加到生产实践中去。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内在渗透与互动趋势,正如马克思曾预言的:“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人的科学,就像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① 这一论述在今天显示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8页。

真知灼见,对我们准确理解科教兴国的含义有着重要启迪。

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起才构成人类完整的知识体系。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社会科学的发展常常是一切社会经济发展、科学进步和社会变革的前导。17世纪欧洲所发生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科学革命就是以文艺复兴时期发展起来的先进的社会思想为前导的。18世纪法国爆发的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则为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后来的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及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则创造了整整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也包括开启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时代。当社会科学正确反映了社会现象和社会发展规律时,就能对科学技术和生产的发展,对社会的前进起巨大的推动作用。

社会科学曾深受自然科学影响,但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前者移植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和采取其客观主义的理论标准,是外在单向的互动;而且二者在研究对象上各有不同领域,因而是各自独立的知识王国,始终缺少一种在尊重各自独立性前提下的内在渗透与互动的紧密联系。

当代人类实践活动已内在地把社会科学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代人类的许多重大问题,如生态、人口、经济规划等内在地呼唤二者的通力合作。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已形成一系列跨学科研究的新领域与新方法,并在许多大规模的社会实验与社会工程中相得益彰、相互协作。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许多以往截然不同的观念正变得相容、趋同与接近,甚至一致。

长期以来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界限分明。以“市场”为主题的政治学,以“国家”为主题的政治学,以“市民社会”为主题的社会学等,均拥有各自独立的研究领域与方式。但在当今人们日益认识

到,各学科间的分工具有相当大的人为性,它只应是一定时期为推动各学科走向独立而产生的暂时现象,因而并不反映“社会现实本身”。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势之一,便表现为超越学科间的硬性壁垒而走向它们的综合和融汇,它强调各学科的对话、合作与互补,要求在“跨学科”的研究中从多角度把握认识对象,以更好地理解社会现实完整的面貌。例如,经济学家们越来越认为“经济”本身依存政治、社会制度、国际社会甚至个体的行为与心理,因此经济学必须与其他学科相结合才能真正把握经济现象;社会学也在与其他社会科学的联姻中,产生了诸如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等众多交叉学科,尤其随着系统论、控制论、全球学、社会发展研究的兴起,更掀起了一个跨学科综合研究的高潮。

“分化”与“综合”是学科发展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社会科学各学科经过长期分门别类的独立发展,日渐成熟,是以牺牲对整体的把握为代价的。人类社会现实从来就是政治、经济、文化不可分割、相互影响的整体,因而是“多种规定性的综合”与“多样性的统一”,所以通过各学科的合作,才能更全面地把握社会现实的具体。社会科学与现实具体的关系曲线成正比的原理要求当代社会科学紧贴现实生活,扎根现实生活世界。

经过深刻反省,当代社会科学明确意识到,只有立足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世界,社会科学才能获得其最本源的意义源泉与现实力量。例如经济学自觉地认识到离开生活,世界的经济学只能产生不负责任的政策,社会学中人文主义的兴起,政治学对人性问题的关注,管理学中对人本主义的强调等等,都不同程度地表明了社会科学自觉寻觅现实生活世界之根,真正服务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性追求。

二、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

当代科学技术作为巨大的历史力量,以人们难以预想的速度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文明进程。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信息化浪潮滚滚而来,把人类社会推向了一个崭新的以知识价值革命为特征的经济时代即知识经济时代。人们长久以来一直认为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因果联系,而那些对人们的审美趣味、行为准则、生活信念和各种价值判断具有影响力的人文知识,却一向被视为不可能带来经济效益的“非经济因素”,甚至在“重本抑末”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它们一直是经济发展的抑制性因素。然而,随着现代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一体化发展,一向被视为“非经济因素”的人文知识与作为传统经济内容的技术、产品和产业之间,发生了全新的、本质性的互渗关系。不仅如此,在知识产业的框架中,人文知识直接成为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的资源。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创新体系”研究小组的报告强调和论证了知识经济时代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性。^①

该报告认为:我国的“国家创新体系”不仅要强调知识转化为生产力这一战略目标,还要重视知识(尤其是人文知识)转化为制度创新能力这一战略主题,实现以知识为基础的制度创新。毫无疑问,强调科技成果转化成为生产力,对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单纯强调知识——尤其是技术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惟一重要性,有可能使我们的“国家创新体系”方案设计带有重指标增长、轻制度建设的偏向。只有立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协调发展的“整体论”观点,我们才会清晰地认识到,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表现为生产力落后,还表现在各种制度创新水平和

^① 参见《光明日报》1999 年 11 月 5 日理论版。

能力严重落后。

正是基于这种“整体论”立场，该报告认为，构建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应该充分考虑如下三条基本法则。(1)一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越来越取决于该社会的知识供给能力。在“前知识经济”时代，一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要取决于该社会的劳动供给能力和资本供给能力，这种“物质生产力”主要靠外延指标来衡量。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一个社会的知识供给能力直接决定着该社会产出知识产品的能力。传统的“物质生产力”概念，将被“以知识为基础的生产力”概念所取代。对这种生产力水平的衡量不仅靠外延指标，而且靠内涵指标。(2)一个社会的知识供给能力主要取决于该社会的制度供给能力。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供给能力是由社会化、市场化的知识供给机制来保障的。我国不仅是个“前知识经济”社会，而且还是个长期拒斥商品经济的传统型社会。这个现实决定了我国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要承担双倍繁重的制度创新任务：既要全面确立和完善现代市场机制，又要确立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创新、流通和应用机制。这种知识供给机制应当是社会化、市场化的，这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本质要求。(3)一个社会的制度供给能力，是以人文知识的研究水平和社会化程度来保障的。我们知道，OECD 文件提出的“制度创新”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西方经济理论、社会理论等多种人文思想发展的产物。该文件的创制本身生动表明，现代社会的制度创新能力首先取决于人文知识的创新能力，人文知识的创新能力首先取决于人文知识的创新能力，此外，人文知识的创新能力取决于它与社会的链接程度，取决于它的社会化、产业化操作程度。总之，一个社会的制度创新如果是科学的，就必须以人文知识为基础，并由一个社会化的机制来保障。基于上述分析，对于我们这个处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我国“国家创新体系”更应当具有整体论的战略眼光，以避免成

为“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应急方案。因此,它一方面应当重视知识(包括人文知识)与企业、市场的链接,以提高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也要强调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与社会制度创新过程的链接,以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概言之,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必然要求“以知识为基础的制度创新”为条件。归根结底,“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应与“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协调发展。

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力,以知识为基础的制度创新能力,得到制度保障的知识供给能力,这是“知识经济”概念的三大要素。可以说,如果国家的“国家创新体系”只强调发展物质生产力,而忽视制度创新能力,那它就仍是一个传统型社会的“国家创新体系”;如果国家的制度创新远离人文知识的深入研究,以非社会化方式进行,这种制度创新就不可能符合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

时代的划分,主要依据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劳动结构和消费结构。一般说来,当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 80% 左右时,称之为农业经济时代;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 80% 左右时,称之为工业经济时代;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 80% 左右时,称之为知识经济时代。当然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状态而言,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充其量不过处于知识经济的边缘,或者说是“前知识经济”时期,但积极回应知识经济对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教育改革、体制和观念变革的召唤是有益的、及时的。其一,强调人文社会科学对制度设计和创新的作用,有助于我们确立战略眼光,避免发达国家曾经失误和教训,少走或不走弯路,自觉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要求,尽快步入知识经济的轨道;其二,强调人文社会科学对人力资源开发精英人才培养的作用,有助于我们迅速走向知识经济,参与国际竞争。

社会科学的这种作用恰恰就是它的功能所在。一般而言,社会科学的功能主要是解释、指导和预见。结合我国社会生活实际,

社会科学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培养人。社会科学是认识社会的主要工具。笔者以为江泽民所说的社会科学事关中华民族的兴亡的含义除了要用社会科学理论指导社会发展这一条之外，再重要的一条就是用先进的社会科学理论知识（包括技能）来培养人、武装人。通过社会科学艰苦的努力来影响、改变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认识，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的认识，使人们的认识跟上变动不居的社会变迁过程，为人们创设健康的理性的心理家园，为人们提供科学的、先进的价值观和高品质的人文关怀，激发人们的创造性和对美好未来的追求，提高社会成员的素质。事实证明，人民大众的生活信念、生活趣味、艺术修养、道德规范等大都取决于社会科学素养的素质背景。社会科学的发达才真正意味着民族的强盛和社会的发达。

第二，制度创新。先进的社会科学理论担当着为社会发展导向的神圣使命。在当代，社会科学特别是其中的人文科学，已不仅作为渗透因素对经济领域各环节产生重要影响，而且日益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因素。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同时是一个社会转型过程，一个社会制度不断完善、创新的过程。社会制度的创新和设计，要以社会科学研究的水平及社会化程度来支持和保障。就政治而言，社会制度的理性设计和创新需要得到广大社会的公众的理念和行为的支持，也就是说现代公民社会的基础就是本源于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现代观念、现代行为方式。列宁有言，“文盲是在政治之外的”。

第三，为决策服务。社会科学作为知识形态不仅具有对自然界和社会发展的解释能力，并且在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实践、新问题及时作出理论概括，它还担当着社会发展的“策划”角色，即为决策服务的作用，与之相应产生所谓“社会技术”。当今世界全面

进入“策划时代”，面对国际国内层出不穷问题的出现和各种复杂挑战。美国两位誉为对全球事务和人类生存状况最具洞察力的评论家罗伯特·怀特和罗伯特·凯普兰对“世界将向何处去”提出了看法，他们认为：“首先，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努力实现现代化。虽然历史告诉我们，现代的民主制度可以带来稳定，但历史也警示我们，创建和发展民主体制的过程，通常是与混乱和危机相伴而生的。在通常情况下，经济增长（而不是贫困）会引发政治动荡。其次，对民族国家的稳定构成强大挑战的另一个因素是人口问题。在今后 10—20 年内，如果你只关注特定的 20—30 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发展态势，就会发现年轻人的数量在急剧增长。他们是一个 15—29 岁的、急需就业机会的、激进的群体。与此同时，在一些西方国家，人口的老龄化问题却日趋严重，已经使这些国家的年轻人不堪重负。第三，另一大挑战是城市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21 世纪将有 50% 以上的全球人口居住在城市里。城市社区要比农村社区难管理得多。城市化增大了各国领导人犯错误的几率，同时缩小了他们成功地实施其政策的缓冲余地。第四，资源短缺，尤其是水资源的匮乏，也将对世界的前途构成严重挑战。资源短缺必将引发公众的不满和世界性危机。第五，全球变暖（温室效应）问题也变得越来越严重。全球性的温室效应正在使世界气候趋于变化无常。洪水泛滥和持续干旱已经使许多国家陷于生存危机，而自然灾害常常是政治动荡的前奏。指出以上的种种挑战和危机，是为了引发大家的注意和提醒，因为只有先充分暴露矛盾，然后才能更好地解决它们。”^①显然，这两位学者的提醒对我们非常有益，这正是我们面对的世界背景和需着力解决的大问题。我们要有对各种问题的透彻了解、分析和预测，形成前瞻性的应对能

^① 引自《社会科学报》，2001 年 11 月 22 日。

力,提出正确的政策选择,对未来进行可行性的设计。决策科学的发展使许多研究者注意到,在决策过程中,固然决策者的直觉思维、信仰、意志力、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对决策的质量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他们的社会科学素养则是影响着决策的科学性和创造性的最重要因素。社会科学的社会化程度又决定着决策正确与否、效果如何的最基本的背景。总之,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科学前程无量。

三、世界经验的升华

现代社会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同现代国家的演变,同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从工业化以前的传统农业社会转化为工业化的城市社会有密切的交互作用关系。它一方面为现代国家的转型和制度化建设提供学术论证和意识形态支持,另一方面在实施国家管理(比如财政管理)、解决社会问题(如犯罪分析、教育政策)方面提供技术支持。近代以来,许多国家在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上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科教兴国的战略,虽然表述和做法有所不同。^①

最早的工业化国家英国是世界上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19世纪成为世界最强的工业化国家、世界经济和科学中心。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经济环境的资本主义化和思想领域的人文主义化,又为科学技术在英国的蓬勃发展提供了难得的环境。17-18世纪科学和教育活动在英国得到空前的重视和普及,牛津、剑桥两校自17世纪中叶开始大力发展自然科学教育。1662年英王批准成立“以促进自然科学为宗旨的伦敦皇家学会”,这是世界上最古老而未中断过的科学学会。由此,为工业革命的兴起做了科学知识和技术人才的准备。17-18世纪英国出现了以牛

^① 参见余建华等“近代以来若干国家科教兴国战略比较研究及启迪”,载《学术季刊》2002年第2期。